

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

边馥琴 约翰·罗根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compa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the coresidence of parents with adult children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ose not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 live close contact and help their parents. Data utilized in this analysis are a 1993 random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two major Chinese cities—Tianjin and Shanghai, and a 1989 personal interview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Albany-Schenectady-Troy,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Findings presen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y patterns and relations in these two markedly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现代化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家庭逐渐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扩大的亲属关系网减弱，血缘联结方式瓦解……核心家庭成为更独立的亲属单位”（Good, 1963: 6）。现代化理论还认为，随着现代经济的全面发展，生产活动从家庭走向工厂。新的工业系统需要灵活的、适合流动的家庭形式——核心家庭；分布于城市各区域的工作机会，创造了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流动性，从而拉大了亲属间在地理与社会上的差距；而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则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由此导致现代化与亲属系统在许多方面的对立，扩大的亲属关系事实上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于是亲属关系结构就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牺牲品或曰障碍。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很长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家庭问题的研究领域，一直被“集中方式”所统治。即“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过程，在家庭、亲属关系及其他基本的体制安排上，它们逐渐高度模仿发达国家”（Bernard, Mogney & Smith, 1986: 151）。“集中方式”主张，现代化对家庭的影响，是同质化、欧洲化（或美洲化）的过程。

由于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美国不同，亚洲的家庭在大多数人的社会支持中显得更为重要。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我们提出两个需要印证的假设：1. 伴随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庭的地位是否像美国一样受到削弱？2. 中国的家庭是否美国化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中美家庭形式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来检验我们提出的假设。具体做法是，通过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的情况、单独居住的子女与家长的居住距离，以及子女与家长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等，进行中美两国的比较分析。

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美国、中国和亚洲的家庭代际关系问题研究，有两个突出的发现。第一是以谁为中心——在美国是以孩子为中心，在中国（及亚洲多数国家）是以家长为中心。

第二是有无性别差异——在美国, 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不受子女性别的影响, 而在中国(及多数亚洲国家), 家长对儿子的偏爱则远远超过女儿。下面, 我们对上述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做个简要的概括。

美国早期的老年学研究, 多强调成年子女对家长的帮助, 而近期老年学研究则注重家长与子女的双向帮助。他们发现, 事实上美国家长对子女的帮助远多于子女对家长的帮助, 而且子女的需要更能影响他们是否得到帮助(Eggebean & Hogan, 1990; Uhlenberg & Cooney, 1992; Rossi & Rossi, 1990)。另外, 有关家长是否与子女同住的研究也发现, 孩子的需要比家长的需要更能影响双方是否同住。Aquilino (1990)的研究指出, 不仅那些刚刚进入成年的子女, 在结婚生育前由于经济上并不富裕而很可能与父母同住, 就是那些已成年离家后的子女, 也可能由于本身的需要而再与父母同住。

与美国的情况相反, 中国及亚洲的家庭关系研究发现, 成年子女对家长的帮助要多于家长对子女的帮助(Lee, Parish & Willis, 1994; Sun & Liu, 1994; 胡汝泉、叶乃滋, 1991), 而且家长的需要(如年长、丧偶、有病或低收入等)更能影响他们是否得到帮助(Hermalin, Ofstedal & Lee, 1992; Parish & Willis, 1994)。关于家长与子女同住的问题, 最新的研究表明, 家长与子女的需要都会影响到他们是否同住。例如, 一方面, 年轻的未婚子女更多地与父母同住, 这反映了孩子逐渐成熟进而独立的正常过程。另一方面, 丧偶的父母更可能与子女同住, 它反映出丧偶的家长需要子女的陪伴和支持。多项对中国城市子女与父母同住问题的研究均表明, 以家长为中心在中国家庭关系中具有普遍性。他们还指出, 年高、体差的家长更愿意、并且实际上更可能与已婚子女同住(田雪原等, 1991; 胡汝泉、叶乃滋, 1991; 凌意珍、白克生, 1986; Unger, 1993)。

美国、中国及亚洲对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有无性别差异。美国代际关系的特征是无性别差异。最近的研究发现, 美国孩子的性别并不一定是影响是否与家长同住的关键因素, 相反, 倒是子女的数目会对是否与父母同住产生影响(Spitze & Logan, 1990)。另一项研究显示, 家长对儿子或女儿的偏好, 实际上往往与家长的年龄和婚姻状况有关(Wolf & Soldo, 1998; Troll et al, 1979; Cooney, 1989; Aquilino, 1990)。还有一些研究指出, 女儿与家长的交往更多, 在扮演代际支持的角色中比儿子更重要(Crimmins & Ingegner, 1990; Brody, 1985; Litwak, 1985; Rossi, 1990)。

与美国不同, 亚洲家庭在代际关系上存在着很强的性别倾向, 即对儿子的偏好。许多亚洲的研究发现, 父母有愿意与儿子(特别是已婚儿子或是长子)同住的强烈趋向(Weinstein et al, 1990; Martin, 1989; Casterline et al, 1991; Hermalin et al, 1992; Lee et al, 1994; Tsuya & Martin, 1992; Kojima, 1989)。在台湾, 父母是否与子女同住, 取决于儿子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 没有儿子或女儿是长女的父母, 才与女儿同住。Hermalin 1992年的研究指出, 台湾子女在为父母提供体力帮助和经济支持方面, 儿子比女儿付出的更多, 台湾老人与儿子的联系比女儿更紧密(Hermalin et al, 1992)。中国的学者则指出, 无论是同住, 还是代际间联系及帮助, 儿子都比女儿重要得多(Parish & Whyte, 1978; 胡汝泉, 1986; 胡汝泉、叶乃滋, 1991)。

上面, 我们简要地概括了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美及亚洲家庭代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下面, 我们将以中国及美国城市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 就家庭代际关系进行专题性的多变量统计分析和对比研究。这正是本次研究区别以往的不同点, 也是在该领域第一次运用多变量分析方法, 对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我们相信, 基于我们已掌握的大量统计

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比研究来回答我们文章开始提出的两个假设,将会更有说服力。

本研究所用的资料包括,中国两大城市天津和上海 1993 年随机抽样调查和美国纽约州奥本尼都会区 1989 年的访问调查。中国的资料包括 2096 名 21 岁以上的被访者,年龄中位数为 45 岁,女性占 40%;美国的资料包括 808 名 40 岁以上的被访者,年龄中位数为 58 岁,女性占 64%。这两项调查中,被访者都被问到关于所有在世父母与子女的详细情况。因此该资料对中美代际关系对比研究有着显著的优势。它使我们可以从成年子女及父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因为有些被调查者是有在世父母的成年子女,有些被调查者则是有成年子女的为人父母。其次,分析的单位可以是整个家庭,也可以是家长与某一子女相对的样本。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分析家长与所有子女的关系,也可以分析家长与某个子女的关系。

下面,我们从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情况,不同住子女与家长的居住距离,不同住子女与家长间的互访及互助等四个方面,报告我们的比较分析结果。

1. 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

在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方面,中美之间的比例很悬殊。在中国,已婚子女(特别是儿子)与家长同住相当普遍;而在美国,这种现象却很少见。Martin 1988 年考察了 14 个亚洲国家,发现 80 年代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是 75%,而在美国却只有 18%。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就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表 1 成年子女与家长同住的百分比
(以孩子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分类)

孩子年龄	孩子性别与婚姻状况				总 计
	未婚儿子	未婚女儿	已婚儿子	已婚女儿	
中国					
30 以下	89%(35)	96%(22)	31%(36)	13%(71)	44%(164)
31—40	79%(24)	65%(17)	27%(293)	5%(321)	19%(655)
41 以上	67%(15)	23%(13)	22%(316)	7%(310)	16%(654)
所有年龄组	81%(74)	67%(52)	25%(645)	7%(703)	21%(1473)
美国					
30 以下	30%(305)	31%(238)	1%(161)	2%(183)	19%(887)
31—40	23%(157)	17%(124)	1%(301)	0%(295)	7%(877)
41 以上	18%(72)	10%(82)	0%(212)	1%(172)	4%(538)
所有年龄组	26%(534)	23%(444)	1%(674)	1%(650)	11%(2302)

注:括号中为该年龄组分类的总数。

表 1 从为人子女者的角度,表现了中美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及与父母同住的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被访者的年龄、婚姻状况,与是否和父母同住有极强的相关关系。中国 30 岁以下的子女与父母同住者相当普遍(44%),而 30 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却明显降低至 16%—21%之间。在每一年龄组中,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要远远低于未婚者。与中国相似,美国 30 岁以下的子女与父母同住的比例为 19%,40 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比例却只有 4%;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者的最高比例也只有 2%,而未婚成年子女却有 30%与父母同住。

如果说中美被调查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对他们是否与父母同住的影响方式是相同的,那么被调查者的性别影响方式却截然不同。在中国,30 岁以上的女性被调查者,无论是未婚还是

已婚,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都比儿子低得多。在被调查的 207 名与父母同住的已婚夫妇中,只有 46 对夫妇与女方父母同住,而与男方父母同住的夫妇,却是前者的三倍。美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子女的性别对是否与父母同住的影响不大。正如表 1 中显示,美国被调查者中,12% 的儿子及 10% 的女儿与家长同住。

在双变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控制与父母同住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做多变量的分析。附录 1(A 和 B)显示了家长是否与子女同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两表中都包含了父母和子女的特征。从为人子女角度看,中美两国子女的状况对是否与父母同住,都有很强的影响;子女的性别在美国的资料中没有显示任何差别,而在中国的资料中却影响显著。从为人父母的角度看,在美国,没有任何父母的特征对是否与子女同住产生影响。这表明,美国的父母与子女是否同住,并不取决于父母的需要。与此相反,在中国,父母的特征明显地影响着与子女同住的关系。多元回归系数表显示,中国成年子女更多地与丧偶母亲同住,也与年长、体弱的父母同住。这些统计分析,恰恰反映了中国父母的需要在决定是否与子女同住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不同住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

如果子女不与父母同住,那他们会住得离父母有多远?下面,我们将把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当作分析子女与父母间联系与帮助的关键因素。中国的调查资料显示,大约 12.5% 的父母与住得最近的子女住在同一居民小区,60% 的父母有子女住在同一城区(估计骑车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这个结果与美国的情况很相似。美国 1984 年老年人健康调查表明,66% 的老人与住得最近的子女的距离在 30 分钟之内(Crimmins & Ingegneri, 1990)。

表 2 不同住的子女距家长住处的距离

距离(以时间计)	中国			美国		
	儿子	女儿	总计	儿子	女儿	总计
≤ 5 分钟	15%	5%	9%	14%	15%	15%
6—10 分钟	6%	6%	6%	12%	13%	13%
11—30 分钟	30%	34%	33%	28%	31%	29%
31—90 分钟	37%	46%	42%	10%	9%	9%
> 90 分钟	12%	9%	10%	36%	32%	34%
样本数	812	1074	1886	1119	1114	2233

表 2 显示了两个国家中不同住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的分布情况。在中国,子女到父母家,用时在 5 分钟以内的占 9%,用时在 30 分钟以内的占 48%。美国与中国十分相近,子女到父母家用时在 5 分钟以内的占 15%,用时在 30 分钟以内的占 57%。然而有一点不同,中国的子女居住地距父母家用时超过 90 分钟的,只有 10%,而美国却占了 34%。这反映了美国的职业流动性大于中国。在美国,子女的性别对他们与父母家的距离影响不大,不论儿子与父母家或女儿与父母家距离的分布都很均衡。而中国则不然,在最近距离(5 分钟之内)和最远距离(90 分钟之内)分布的两端,儿子的比例都要高于女儿。这种情况与是否同住研究中所发现的,对儿子的偏向大不相同。

3 不同住子女与父母的互访

在中国,不同住子女与父母间的互访是很平常的事。研究表明,父母每周能与子女见一面的占 80%,这个数字明显高于美国的 63%(Crimmins & Ingegneri, 1990)。

表 3

家长与不同住子女之间的互访次数

	中国			美国		
	儿子	女儿	总计	儿子	女儿	总计
互访次数						
每天至少一次	10%	5%	8%	7%	9%	8%
几乎每天一次	20%	15%	18%	13%	20%	17%
每周一、两次	36%	44%	40%	20%	21%	20%
每月一、两次	24%	28%	25%	17%	15%	16%
很少或从不见面	10%	8%	9%	43%	35%	39%
每周平均次数	2.3	1.8	2.1	1.4	1.3	1.3
样本数	514	417	931	397	385	782

表 3 显示了父母与某一个不同住子女间的互访情况。在中国,不论儿子还是女儿,与父母的联系次数都相对高于美国。对比如下,中国的子女每天看望父母的占 26%,每周至少看望父母一次的占 66%;而美国被调查者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 25%和 45%。中国被调查者与父母很少来往或几乎没来往的只占 9%,而美国却占 39%。如果以中美被调查者每周看望父母的平均次数作比较,中国人是每周 2.1 次,美国人是每周 1.3 次,中国人比美国人每周看望父母的平均次数高 0.8 次。显然,与父母不同住的中国子女比美国子女更经常地看望自己的父母。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影响着父母与不同住子女间的互访?父母的需要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附录 2(A 和 B)显示了预测父母与所有不同住子女互访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中美两国有一些共同的预测因素。首先,父母的需要与资源(指父母的健康、年龄、就业情况)对父母与子女间的互访,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二,父母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对与子女的互访有显著影响。中国子女看望在世父母的次数要多于看望孤独在世的父亲;而美国单身母亲比单身父亲看望子女的机会多。这些结果均暗示母亲在维系大家庭关系方面的特殊作用。第三,不同住子女数目越多,父母与子女间的互访次数也越频繁。在美国,不同住子女数目每增加一人,父母被访问的机会每月将增加 5 到 6 次,而在中国每月将增加 4 到 8 次。

4. 不同住子女与父母的互助

表 4 显示了父母与不同住子女间的互助情况。我们按“家长接受帮助”和“家长给予帮助”进行分析,其中又细分为“家长与所有子女”和“家长与某一子女”间的互助情况。

首先,我们注意到帮助流向的不同。中国资料显示,父母经常从子女那里接受帮助的占 55%,而子女经常从父母那里接受帮助的却只占 25%。也就是说,向上帮助的流向要强于向下帮助的流向。而美国的情形却截然相反,美国的父母从子女那里接受帮助的占 27%,而父母给予子女帮助的却占 58%。由此证明,中国家庭突出的是“以家长为中心”,而美国家庭则突显“以子女为中心”。

第二,我们注意到帮助类别的不同。在中国,一半左右的父母从子女那里接受过“清扫房间”“买菜购物”的帮助;三分之一左右的父母接受过“修理房屋”“需要时得到照顾”的帮助。而从子女角度看,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帮助,除了“清扫房屋”“买菜购物”等形式较普遍外,“照顾小孩”也很重要。然而在美国,父母却很少从子女那里得到帮助,只有 25%的人可以从所有子女那里接受“家务活”的帮助,约 14%的人可以从某一子女那接受“家务活”的帮助。而美国的父母给予子女的帮助,却是他们得到子女帮助的两倍多。

表 4

家长与不同住成年子女间的互相帮助

	家长接收帮助		家长给予帮助	
	从所有孩子	从某个孩子	给所有孩子	给某个孩子
中国	(n= 606)			(n= 949)
做饭、洗衣、打扫卫生	50%	没回答 *	没回答 *	19%
买菜、购物	49%			19%
修房、修理或其他重活	37%			12%
照料老人	32%			
照顾、辅导孩子				17%
任何形式的帮助	55%			25%
美国	(n= 791)	(n= 791)	(n= 791)	(n= 791)
做饭、洗衣、打扫卫生	7%	4%	21%	13%
买菜、提供交通工具	14%	7%	24%	14%
修房、修理或其他重活	14%	7%	13%	8%
照料老人	没回答 *			
照顾、辅导孩子			38%	21%
任何形式的帮助	27%	14%	58%	39%

*“没回答”指问卷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再通过多元分析,考察父母与不同住子女的关系是否受父母的特征、不同住子女的数目和性别的影响。附录 2(A 和 B)显示了预测父母从所有不同住子女那里得到帮助的回归系数。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中国的资料中,几个代表父母需要的指标(健康、年龄、是否在职)并不影响父母从子女那里所得到的帮助,而在美国的资料中却显示有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中国不同住子女把帮助父母当作自己应尽的孝道,而并不一定非要以父母需要为前提。但是在美国,则表现出年长、体弱和在职的父母接受的帮助更多。附录 2 表明,美国的父母能否从子女那里得到帮助,更多地取决于实际需要。此外,中美两国父母得到的帮助,都显著地受子女数目的影响。当然,父母的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到他们从子女那里可能接受的帮助。

综合资料分析结果,我们看到,在中美两个文化传统显著不同的国家里,其家庭形式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中美被调查者与不同住子女的居住距离一般都较近,且来往频繁,相互帮助。而不同之处则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父母与成年子女(特别是已婚子女)同住的情况始终比较普遍,而在美国却不多见。中国的家长喜欢与儿子同住,有性别偏好,影响他们同住的决定因素往往是家长的需要;而美国的家长对同住子女的性别没有偏好,影响是否同住往往取决于子女的需要。中国的家长更多地从子女那里获得帮助,而美国的家长却更多地给予子女帮助。

在完成对中美两国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对比之后,现在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对比分析来印证前边提出的假设。

首先,我们认为前面提出的假设,不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因为大量调查数据显示,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仅中国家庭的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就是美国家庭的地位也是稳固的。

大量资料显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家庭仍然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重任。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家庭没有失去它独特的作用,仍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家庭关系随现代化的进程而减弱。

将我们对中美两国家庭关系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相比较,不难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性。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父母与子女同住的水平始终保持稳定。费孝通先生在1982年就已发现,江村的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的比例从1936年到1981年,只有少量降低(49%到43%)(费孝通,1982)。崔明和曾毅1982年在中国五大城市八个居民区的调查中发现,将1938年以前结婚的妇女,与1977至1982年结婚的妇女相比,她们生活在主干家庭中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Tsui, 1989; Zeng, 1991)。另外,胡汝泉、叶乃滋以及Unger曾指出,80年代中期,50%的老年家长与已婚的子女住在一起,而我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1988年到1993年)对上海、天津两大城市的调查显示,仍有高达44%的老年家长与已婚子女同住。这些可比资料均显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与子女的同住关系并没有迅速瓦解,而是相对稳定地缓慢地下降。

如果说中国的家庭关系变化不大,那么又如何得出美国家庭关系也相对稳定呢?

我们认为,尽管美国家庭父母与子女的同住关系,在历史上就不典型也不普遍,但家庭代际关系的联系却是强有力的。主要表现在家庭代际之间的互相照顾上。有研究指出,大多数美国年轻一代认为,自己应该孝顺父母、照顾父母,而不应该依赖社会(Brody, 1985; Sussman, 1985)。现实社会中,美国住养老院的老人(其中50%为无子女者)也仅占老人总数的5%(斯皮茨·沃德、边燕杰,1989)。尽管美国人口流动和职业流动率很高,但我们的统计结果仍显示出,57%的子女居住在与父母住地行程30分钟之内的地方;45%的家长至少每周能见到子女一次;27%的家长从子女那里获得过帮助;58%的家长曾给予子女帮助。这些结果都显示出,美国家庭代际之间相互关心的价值观和现实生活中的紧密联系。

第二,我们认为,前面提出的第二个假设:中国的家庭是否美国化了?也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中美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中国的家庭趋向美国化。相反,由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传统文化差异,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同,中美家庭间不仅没有趋同现象,反而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中国的家庭是以“家长为中心”,而美国的家庭是以“子女为中心”;中国家庭很看重子女的性别,偏重男孩,而美国家庭对待子女的态度都一样。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两国传统文化的不同。

再比如,中国的父母更依赖于子女的帮助,而美国的父母却反过来给予子女更多的帮助,表现得更独立。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国传统以孝道为中心的家庭伦理之外,还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因素。美国的父母所以能够表现得更独立,与美国更健全的老人公共服务设施,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与服务,以及个人从工作起就开始交纳的社会保险税、医疗保险税和逐年积累的退休金(到65岁以后才可使用),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两代人之间在经济上和生活中都比较独立,代际间的依赖性较小。因为当老人有困难子女不能提供帮助时,社会公共机构也可以服务上门,所以多数老人更喜欢与子女分开居住。

至于中国家庭关系有没有什么方面正在逐渐与美国趋同,我们认为有。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中国在代际同住问题上反映出强烈的喜欢儿子的趋向,但子女性别对两代人联系的频率和相互帮助,影响却不是很大。这表明,虽然中国城市的父母喜欢与儿子住在一起,但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并不比儿子逊色,事实上可能更强。这种矛盾的统计结果,恰恰意味着中国家庭正在从偏向儿子,转向无性别或弱性别偏向。Davis-Friedman(1991)指出,工业化前的欧洲

正如今天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也曾经偏向儿子。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了老人对儿子的偏好，并且显著地加强了父母与女儿间的联系纽带”。显然，就性别偏向来说，确实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偏向儿子”的文化传统，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也一定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现代化可能仅仅是缓慢地改变家庭代际成员间共同居住的形式。在具有几千年家族传统文化的中国，家庭关系不可能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旋即瓦解。更有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代际之间的同住关系随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对弱化。但如同美国的家庭关系一样，即使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家庭代际之间的紧密联系、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

伴随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中国的家庭关系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但中国某些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却将发生明显变化。比如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同住关系中偏向儿子的倾向，相互依赖性过强导致的老年家庭和青年家庭相对独立性较差的问题，帮助父母往往更多地出于“孝道”，从社会舆论出发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等等。

另外，我们认为，由于中美两国的传统文化不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形式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如果一定说有趋同现象，那也只能表现在由传统观念改变而带来的部分家庭关系表现形式的变化上。目前中国城市进行的社区建设，为中国家庭继续承担养老的重任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中国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在许多具体细节上区别于美国的家庭代际之间的联系方式、代际同住关系和比例。至于中国家庭代际同住的比例会降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稳定住，不好随意揣测，只有留待以后进行对比性的追踪研究。

附录：

附录 1(A) 预测子女与父母或公婆(岳父母)同住的回归系数
(中国资料, 样本数=1373)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家长特征	
鳏夫(参考组为父母均在世)	0.589
寡妇	1.092***
家长年龄(衡量年龄较长的家长)	0.038**
家长健康状况(衡量健康较差的家长)	0.520***
其他孩子的数目	-0.212***
孩子特征	
未婚儿子(参考组为已婚夫妇, 是否与男方家长同住)	2.249***
未婚女儿	2.273***
未婚夫妇, 是否与女方家长同住	-1.502***
儿子, 有兄弟	-0.501
女儿, 有兄弟	-0.860*
本人的小孩数目	-0.286
(衡量健康较差的一方)健康状况	-0.446**

* P<0.05 **P<0.01 ***P<0.001

注: 因变量为“子女是否与父母或公婆(岳父母)同住”(同住=1, 不同住=0)。

该表只报告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附录 1(B)

预测父母与抽选的任何成年子女同住的回归系数

(美国资料, 样本数=802)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父亲与儿子(参考组为母亲与女儿)	0.018
母亲与儿子	0.481
父亲与女儿	0.164
家长特征	
家长婚姻状况(在婚)	0.335
家长健康状况	0.044
家长全天工作	0.325
家长半天工作	0.369
家长年龄	0.006
子女特征	
子女在婚	-2.946***
子女健康状况	-0.133
子女全天工作	0.245
子女半天工作	1.180*
本人的小孩数目	-0.552*
未婚的兄弟姐妹数目	0.03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注: 因变量为“父母是否与子女同住”(同住=1, 不同住=0)。

该表只报告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附录 2(A)

预测家长与所有不同住子女间的互访与帮助的回归系数

(中国资料, 样本数=589)

预测变量	访问次数 (每周)	得到帮助次数 (每月)
与住得最近的子女间的距离 (参考组为住在不同的城市)		
同一居民区	6.50***	0.96**
同一街	5.22***	0.57
同一区	2.47***	0.75*
同市不同区	2.14**	0.52
对此问题没回答	6.97***	0.54
家长与任何年龄的子女同住	-0.91**	-0.28
家长有(没有)不同住的儿子	0.48	-0.19
家长婚姻状况(参考组为父母均在世)		
鳏夫	-1.52*	-0.15
寡妇	-0.43	0.65**
家长不同住的子女数目	1.32***	0.18**
家长健康状况(衡量健康较差的家长)	-0.12	0.11
家长年龄(衡量年龄较长的家长)	0.01	0.01
家长是否工作(任何一方)	0.54	0.16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注: 该表只报告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预测变量	访问次数 (每周)	得到帮助次数 (每周)
单身父亲(参考组为单身母亲)	-3.051 ^{***}	-1.954 [*]
在婚母亲	1.947	-0.861
在婚父亲	3.244	-0.956
家长年龄	0.064	0.69 ^{**}
家长健康状况	0.118	-0.604 [*]
家长全天工作	3.083	1.370 [*]
家长半天工作	2.904	0.908
不同住的成年子女数目	5.502 ^{***}	0.370 ^{**}

^{*}p<0.05 ^{**}p<0.01 ^{***}p<0.001.

注: 该表只报告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参考文献:

- 费孝通, 1982,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 《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
- 胡汝泉, 1986,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天津、武汉及其他城市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胡汝泉、叶乃滋, 1991, 《1988年中国九城市老年调查》, 天津教育出版社。
- 凌意珍、白克生, 1986, 《上海市区的老年人家庭》,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潘允康、约克·罗根、边馥琴、边燕杰、关颖、卢汉龙, 1997, 《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 《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斯皮茨·沃德、边燕杰, 1989, 《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 美国的情况》,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田雪原、熊郁、熊必俊, 1991, 《中国老年人口社会》, 中国经济出版社。
- Aquilino, William 1990, "The Likelihood of Parent-Child Coresidence: Effect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Parental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2.
- Bernard, Farber, John Mogney & Karen S. Smith 1986 "Introduction; Kinship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 17(Summer).
- Brody, Elaine M. 1985, "Parent Care as a Normative Family Stress." *The Gerontologist*, Vol. 25.
- Casterline, John B., Linda Williams, Albert Hermalin, M. C. Chang, Napaporn Chayovan, Paul Cheung, Lita Domingo, John Knodel & Mary Beth Ofstedal 1991, "Differences in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four Asian Countries: The Interplay of Constraints and Preference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lderly in As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 Cooney, Teresa 1989 "Co-Residence with Adult Children: A Comparison of Divorced and Widowed Women." *The Gerontologist* 29: 779-84.
- Crimmins Eileen & Dominique Ingegneri 1990, "Interaction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on Aging*, Vol. 12.
- Devis-Friedman, Deborah 1991,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ggebean, David J. & Dennis P. Hogan 1990, "Giving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American Families." *Human Nature*, Vol. 1.
- Good, William S.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Cliever-Macmillan Limited London.

- Hermalin, Albert I., Mary Beth Ofstedal & Mei-Lin Lee 1992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lderly in Asi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 Kojima, Hiroshi 1989,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 Extension in Japan." in *Ethnicity and the New Family economy*, edited by Fances Goldscheider & calvin Goldscheider, Westview Press.
- Lee Year-ju, William L. Parish & Robert J. Willis 1994,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 Litwak, Eugene 1985, *Helping the Elderly: The Coplementary Roles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Formal System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Martin, Linda G. 1989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Fiji, Kore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Demography*, Vol. 26.
- Pan, Yun Kang & Nan Lin 1987, "A Mod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families." *Sociological Research*, Vol. 3.
- Parish, William L. & Martin K. Whyte 1978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si, Alice S. & Peter H. Rossi 1990, *Of Human Bond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Aldine de Gruyter.
- Spitze, Glenn & John R. Logan 1990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2.
- Sun, Te-Hsiung & Yin-Hsing Liu 1994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hinese Family: Taiwan's Experience." i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Asian Family*, edited by Lee-Tay Cho & Moto Yada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 Sussman, M. 1985, "The Family Life of Old People." In *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R. Binstock & E. Shana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Tsuya, Noriko and Linda Martin 1992, "Living Arrangements of Elderly Japanese and Attitudes Toward Inheritanc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Vol. 47.
- Tsui, Ming 1989,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1.
- Uhlenberg, Peter & Teresa M. Cooney 1992, "Support from Parents over the Life Course: The Adult Child's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Vol. 71.
- Unger, Jonathan 1993, "Urban Families in the Eighti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Surveys."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edited by Deborah Davis & Steven Harre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nstein, Maxine, Te-Hsiung Sun, Ming-Chen Chang & Ronald Freedman 1990,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65-1985." *Population Studies* Vol. 44.
- Wolf, Douglas A. & Beth Soldo 1998, "Household Composition Choices of Older Unmarried Women." *Demography*, Vol. 25.
- Yang, Hongqiu 1996 "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8.
- Zeng, Yi 1991, *Family Dynamics in China: A Life Table Analy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作者边馥琴系美国纽约州政府健康部调研员,社会学博士
 约翰·罗根系美国纽约奥本尼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谭深